

借助外力的動員： 澳門社會運動中的外部動員機制*

廖 志 輝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

摘 要

近年兩岸四地的公民社會持續振動。當中，對於 2014 年分別發生在台灣、香港和澳門的大型社會運動，已有研究透過比較或概念性的分析，嘗試探討其背後共同成因與差異性。卻鮮少有研究從微觀層次探討台港澳三地社會抗爭的互動過程。透過以發生在 2014 年澳門的「反離補運動」的動員過程與後續影響作為研究個案，本文認為是運動組織者靈活地運用來自香港媒體與台灣的相關抗爭論述作為資源，重新構框出適合在地脈絡的動員論述，從而成功地促進了在封閉的政治結構與貧乏的動員渠道下的動員能力，造就這場澳門回歸後最大型的社會運動。這一動員機制在後續的抗爭事件中亦同樣出現，並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

關鍵詞：反離補運動、機制與過程、社會運動、台港澳

* * *

壹、前 言

2014 年 5 月 25 日，20,000 澳門人在原本已擠擁的交通道路上步履前進，由市中心廣場遊行至政府總部，原本僅需二十分鐘的路程竟持續約半天，烈日當空之下人們喊得最響亮的口號是「撤回！」和「崔世安，下台！」；另有不少人手持「貪官離補、實在離譜」的標語和媒體的標題報導：「澳門修例設保護罩、特首任內免刑責」。抗議行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6 年中國政治學年會」，感謝評論人張傳賢教授的意見。也感謝期刊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的建議與洞見，得以讓文章趨於完善；感謝林玉鳳教授願意給予相關未發表的重要數據，王韻老師持續的鼓勵與支持。最後，感謝方瑜的支持，無言感激。本文內容如有錯誤，由作者自負，也歡迎任何意見與指教，並附上作者聯絡方式：jasper.chifailio@gmail.com。

動持續進行，兩天後，澳門立法會被 7,000 名市民包圍，組織者再度高呼「崔世安不撤回法案，澳門人便撤回崔世安！」更有抗議者向保守派議員拋擲雜物，抗爭場面幾近失控。再兩天後，正尋求連任的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記者會上正式宣布撤回引起爭議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以下簡稱：〈離補法〉）。^①事後看來，這次「反離補運動」的參與人數既是澳門回歸十五年來所有遊行之最，也是 1989 年聲援六四事件之後本地最大型的社會運動；同年底的民調則顯示市民對本屆政府的滿意度跌至新低，政府威信嚴重受挫（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2014；蘋果日報 2014a）。

事實上，澳門抗爭者面對的是極為不利的情勢，長年由親北京陣營主導的立法會已經在遊行前夕加快審議進度；本地受眾最多的主流媒體連日來也不遺餘力為法案正當性護航，更有支持立法的遊行出現。從社會運動的研究視角會問：在政治結構不利和動員資源缺乏的情況下，抗爭者如何從事動員工作？促使市民參與到運動之中的可能性解釋是什麼？

本文認為，來自澳門外部的香港媒體作為動員媒介發揮了重要且關鍵的啓示作用。透過香港媒體在事件初期針對法案不公平性的大幅報導，激發因澳門社會對香港媒體既有的資訊依賴所形成的動員招募網絡（recruitment networks）；香港媒體對法案的報導，既激發市民對法案的不公義理解，若干抗爭者更依賴自身與台灣公民社會的聯繫，學習香港媒體與「太陽花學運」的論述與抗爭劇碼，這些外部資源都有利抗爭者進行再構框（reframing），不同程度地強化了抗爭者的動員能力。

近年來，基於兩岸四地公民社會的持續振盪，已有研究開始對這波社會抗爭進行細緻的比較（Ieong 2017；何明修 2017）；或從宏觀角度探究其背後成因（Kaeding 2014；Yuen 2014）；甚至提出「跨海峽公民社會」、社會運動結盟等解釋概念（吳介民 2012, 138；2014）；然而在中層和微觀層次上，探討兩岸四地抗爭互動的研究仍相對稀少（Kaeding 2015）。澳門的案例某程度補充了研究議題上的缺失，揭示了台港因素如何實際作用在澳門社會運動的微觀動員機制上。即透過來自自由化程度更高的外部渠道對本地抗爭者的「間接」賦權（empowerment），後者便能在先天不足的政治環境下獲得重要的動員資源，然而更重要的是抗爭者如何有效運用既有資源，創造出合適的抗爭條件。^②

若干前提與概念必須說明與定義。誠言，本文並非要論證導致兩萬人上街的原因

註① 〈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的主要爭議有兩方面：第一，對離任高官的補償金是否合理。因為特首下一級的司長全為政治任命，故不屬公務員體系，但法案認為要吸納政府人才，必須提高非公務員體系官員的補償金，然而公務員體系成員退休後卻得不到相同的增幅；第二，作為澳門特區的最高行政長官，在任時應否擁有刑事豁免權。法案企圖讓特首在任時免刑責，但反對者認為澳門並非主權獨立實體，地方行政長官不能等同國家元首般擁有刑事豁免。

註② 然而我們不能將抗爭者的自主性過度放大，其他因素也可能阻礙抗爭者選擇最有利的動員路徑，因為人們在既有結構和認知上雖有相當能动性，也同時受限。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澳門的抗爭者也同樣受若干因素所限制而放棄了其他有利動員的可能性，更多的討論將在總結部分呈現。

只有香港媒體的論述與抗爭者的成功構框，如此可能會招來過度志願論的批評，也永遠無法直接驗證其因果關係。事實上，議題具急切性、政治時機的好壞都可能增加市民參與的動機。^③本文只欲指認出港台作為動員資源，如何參與到澳門的社會運動當中，並達到某程度的動員效果。

其次，本文對於「機制」(mechanism)的概念，源發自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等人的經典定義。他們認為，在「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 的分析中，「機制」主要用於中層分析，其關注抗爭事件當中相似的元素（人或互動關係）如何在不同環境下產生相似的效果，故「機制」也有著重複出現的可能性。是以，本文提出的「外部動員機制」，也應該有著若干可重複性。

本文的研究資料主要來自田野訪談與不同類型的出版品，研究者也實際參與了 2014 年反離補運動的遊行與集會。訪談方面，自 2016 年 6 月到 2017 年 2 月，研究者先後與五個公民團體的若干成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當中包括運動的主要組織團體、有參與運動但並非決策成員的邊緣團體和沒有參與是次運動的社運團體，受訪者的身分包括學生、大學教授、基督徒、政黨成員等（受訪者資料見附錄一）。出版品除大量的媒體報導外，也包括由抗爭者事後出版的回憶錄等。

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本文先對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進行理論上的疏理；其後討論澳門既有的政治結構與資源如何不利抗爭者的政治動員；並透過整理「反離補運動」的源起、背景、動員過程與結果，分析抗爭者如何在不利的政治環境下從事動員工作；當中，香港媒體與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又如何促使了運動的進行；並透過檢視另一場發生在 2016 年中，運動性質高度相似的「暨大一億」事件中的動員過程，來驗證整個動員機制的形成；總結部分將進行理論的回應，並提出進一步研究的可能性。

貳、人們為何參與抗爭

一、潛在支持者的形成

一場社會運動的出現有著不同的解釋面向，^④基於本文關心的是抗爭者的動員工作如何影響市民參與到社運之中，故本節討論將聚焦抗爭者與大眾的互動關係上。^⑤

註③ 雖然其時正值澳門特區換屆選舉，但本文認為此一因素對運動過程的影響力有限，在下文中會進一步說明。

註④ 如有利抗爭者的政治時機是否出現、抗爭者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從事動員工作，以及抗爭者的論述能否打動人們，使其產生共鳴並參與到社運之中（McAdam et al. 1996）。

註⑤ 當然，任何社會行為都是嵌入（embedded）於不同的社會脈絡而開展，人們的選擇往往受既有的社會結構所限制。同理，既然政權無論作為當今社會運動的抗爭對象或仲裁者，都高度牽涉其中，社會運動的進程自然也被政治結構的不同因素所限制（Tilly 2004, 3-4）。而我們也將在後續討論說明，澳門封閉的政治結構如何不利抗爭者的動員工作。

如 Snyder 和 Tilly (1972, 15) 所言，抗爭者作為既有權力關係中的弱勢，其抗爭目的與動員工作其實就是一種權力爭奪的表現，所以「沒有爭奪權力的團體是沒有動員的」。既然動員工作對社會運動的成敗如此重要，抗爭者如何能動員足夠多的人參與社運自然是重要的問題。然而，從事動員工作需要相當的資源，這些來自社會的資源幫助社運組織吸納成員和支持者，資源的充足與否固然影響了動員效果 (McCarthy and Zald 1977, 1213)。

其中，有否足夠的宣傳資源對社運組織能否向大眾宣揚抗爭議題和理念，尤為重要。因為動員工作的首要元素是：社會必須存在潛在被動員的人群，這些人群既認同抗爭者的理念，也願意從事抗爭行動；但即使社運組織與大眾達成了某種共識，如果這些人沒有「預先」進入一個動員招募網絡 (recruitment networks)，潛在的被動員人群也不一定能轉化為實際的支持者 (Klandermans and Oegema 1987, 519-520)。簡而言之，任何社會運動都有支持者和反對者，而社運組織作為權力關係中的相對弱勢，其動員能力與資源必然有限，故如何將大眾納入社運組織的可動員範圍內，便成為組織者需要思考的問題：動員範圍怎樣形成？是否有資源或渠道將潛在支持者納入動員範圍內？這一可動員範圍便是動員招募網絡，一種有利動員的媒介 (vehicles)。

McAdam (1996, 3) 等人將這類「媒介／招募網絡」稱為「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s)，人們通過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結構從事動員工作並參與到集體行動之中。媒介既可以是大眾媒體、組織間的連結，甚至是朋友圈等非正式且虛擬的關係結構，也可以是實際存在的實體結構。^⑥

雖然「動員招募網絡／動員結構」的形成對初期的動員工作如此重要，但不能忽視的是，即使既有的動員結構有利抗爭者從事動員工作，人們仍然有相當的自主性選擇參與或不參與到集體行動之中。是故，大眾如何理解抗爭者提出的理念，是否產生參與的動機也是抗爭者與大眾互動之間必須處理的另一難題。

二、抗爭者的構框與大眾的認知

不難理解，即使抗爭者的動員論述如何繪聲繪影，如果接收資訊的大眾不能認知（或不認為）不公義的遭遇和壓迫確實存在，自然不會產生參加集體行動的動機。^⑦可以說，良好的抗爭者與大眾互動邏輯應是：抗爭者的動員論述要能激發潛在群眾的參與動機，並能消除大眾的疑慮，這些攸關組織者的策略；同時，大眾也要認同抗爭

註⑥ 如趙鼎新 (2007) 在北京六四運動的研究中，便提出北京市高度集中的大學空間分布和密集的宿舍生活環境，如何有利學生不滿情緒的滋長，並在運動期間促進了相關資訊的傳播。

註⑦ 主觀認知一直是社會運動研究的一個重要議題。例如在 McAdam 經典的政治過程模型中，便將大眾的「認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 視為社運能夠出現的最後一哩路 (McAdam 1982, 34)。了解大眾認知的重要性在於抗爭行為的本質。與投票、諮詢等正式的政治行為不同，集體抗爭經常遊走在合法與非法邊緣，參加者因此要經常考量各種抗爭行為的風險。Tilly (1978) 便以這樣的預設提出有關抗爭者和政權互動的「機會／威脅」概念，強調執政者的回應可能會提高或降低抗爭成本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影響了抗爭者的行動選擇。

者的動員論述、並戰勝來自參與的成本疑慮，動機才能轉化為參與的意願（Klandermans and Oegema 1987, 520）。

Snow（1986, 464, 477）等人提出的構框理論（framing theories）聚焦於抗爭者與大眾之間，有關意義互動的微觀分析層次，分析組織者對運動目標、客觀環境、抗爭手法的解釋圖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即動員論述如何與支持者產生共識的過程，稱為「框架整合過程」（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他們認為，框架與群眾的共鳴度越高，動員便越成功。因為成功喚起參與者的熱情與信念往往能戰勝參與者的成本疑慮，甚至讓參與者重新認識這個世界（何明修 2004, 164）。

如此，構框理論有助我們進一步分析社運參與者的認知過程。Snow（1986, 467-468）等人認為，構框的第一步往往是框架搭橋（frame bridging），即組織者的動員論述要能將抗爭議題連接大眾的日常認知或意識形態，並透過各種渠道將議題擴散（diffusion），從而把理念相近的潛在支持者拉進運動中。例如將抗爭理念訴諸為某種社會價值的保護，讓大眾覺得行動起來是一種必須的義務。Gamson（1992, 174-175）甚至認為將抗爭理念訴諸為某種不公義的情感控訴，從而激起人們覺醒，是動員論述最重要的元素。

Snow 等人的討論對理解上文提到的「動員結構」如何發揮動員作用有其意義，因為有利動員的結構並非重點，重點在於抗爭組織者如何有效利用這一結構，其動員效果才會出現。也就是說，在討論「動員結構」發揮的作用時，應該要同時將大環境的轉變和人們的互動脈絡清楚交代，從而了解大眾是如何與論述產生共鳴的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es）。^⑧

三、分析框架

基於以上討論，本文在回答澳門「反離補運動」的動員過程時，將主要從以下兩個動員面向進行分析：

（一）關注動員過程中的動員結構

這一結構是指作為招募運動支持者的媒介。但發現此一結構和解釋的工作，不能只流於「動員結構促成了動員」的簡單圖像，而應該同時討論客觀動員結構是如何形成，環境轉變與能動者在運動中的互動脈絡是如何促使動員結構有利於動員的過程。如此才能對動員結構有更合理和更具說服力的解釋。

（二）關注抗爭者的論述與群眾的認知

即抗爭者提出的構框如何與潛在支持者產生共鳴的過程。分析過程應該關注抗爭

註⑧ Hedström（2000, 148-149）等人論及社運中的擴散機制時也強調，不能簡單說社運的發生是基於社會網絡下的個人互動；有利的社會網絡發揮動員擴散作用，應是因為環境和脈絡的轉變所形成的具體因果機制。

者的論述運用，例如其怎樣涉取不同的論述資源，再轉化為合乎在地社會脈絡的語境；也要對支持者為何認同其動員框架提出合理的解釋，例如論述是否擊中了支持者的核心關懷或價值觀等。^⑨

參、封閉的政治結構與貧乏的動員資源

社運學者大多認為無論就長期和短期來說，政治結構的穩定度和體制內外政治聯盟的可獲得性，對社會運動的興衰均有重要影響力。^⑩但在澳門的反離補運動前夕，抗爭者面臨的仍然是一個高度穩定且封閉的政治結構，也缺乏有效的宣傳資源，抗爭者卻反而在缺乏政治機會和資源下開展了動員工作。

一、政治結構封閉：先天不足的立法會

雖然菁英分裂往往代表著抗爭的機會，但關鍵仍然取決於人們對機會的主觀認知。在「反離補運動」發生前，卻沒有看到任何政治結構鬆動的現象，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仍然牢牢地控制著立法會。

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立法會雖然擁有制定、修改、暫定和廢除法律的職權，但相關法定程序的門檻卻相當高。例如，立法會對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只有審核和通過的權力，並無否決權；容許由議員單獨或聯署提出的議案，內容不能涉及公共收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議題，若涉及政府運作議題，在提出前還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相反，行政長官的權力卻相當廣泛，既可直接委任若干議員進入立法會，也有權以「行政命令」或「行政法規」的方式直接頒布具約束性的法律。議員對相關法律只能提出「辯論」或「質詢」，卻無權否決（澳門印務局 1999）。這樣一種行政凌駕立法的政體設計，一般被稱作「行政主導關係」，即以行政長官作為核心，強調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間屬互相配合與依賴，而非互相獨立的權力關係（駱偉健 2003, 400）。更具體的情況就如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現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2011, 4）所言：「行政權相對於立法權和司法權處於主動、優先地位。」

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權力不平等反映在立法數據上。以回歸後第一個十年為例（1999~2010 年），四分之三的法律來自行政長官頒布的「行政命令」，只有四分之一由立法會提案並被通過（Yu 2011, 57-74）。而在本屆立法會的第一任會期（2013~2014

註⑨ 遺憾的是目前仍未有任何針對「反離補運動」的大型民意調查，故我們仍無法真正知道大部分參與者是基於那一種信念才參與集體行動的，只能依據若干證據提出一個較合理的解釋。

註⑩ 例如就長期來說，60、70 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興衰與執政黨吸納黑人議員進入體制有關（McAdam 1982）；90 年代初台灣民主化到首次政黨輪替間，環境抗爭運動的興衰也與民進黨從反對黨轉為執政黨有關（何明修 2006, 135-192）；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則提供一個短期政治結構分裂的例子，因為學生能長期佔領立法院的原因之一，無疑是得益於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與總統馬英九因其他議題造成的即使分裂，從而讓王金平有了保護佔領學生的動機（Ho 2015）。

年)中,所有來自議員的法案均被否決;相反,16項政府提案不單沒有任何一項被否決,當中一半的提案在第一任會期便被通過,造就反離補運動的〈離補法〉是唯一被政府主動撤回的法案(澳門立法會2016)。

顯然,除了政治體制不利立法會行使權力外,選舉設計也是另一個造成立會先天不足的原因。回歸至今,立會議席仍以直接選舉、間接選舉和由行政長官委任的官委議員組成,唯一擁有普選基礎的直選議席比例從未過半,而被歸類為泛民主派的議員,則未曾掌握三分之一議席成為「關鍵少數」(見表1)。由勞工、僱主、社福等不同專業界別法人社團推選的間選議席,則長期由親政府與北京的傳統社團統領,官方利用各種社團資助維持間接選舉的高度合作性,^①甚至直接委任傳統社團的領導為官委議員(Kwong 2014; Yu 2007)。故此,在反離補前的歷屆選舉中,間接選舉從沒出現差額競選,由社團政治主導的間選與委任議員,與政府之間實際呈現一種「共謀關係」(Chou 2005, 199-200)。

表1 澳門立法會歷屆議席分布

年	直選議席	間選議席	委任議席	總數	泛民議席比例
1991-2001	8 (1)	8	7	23 (1)	4.3%
2001-2005	10 (2)	10	7	27 (2)	7.4%
2005-2009	12 (3)	10	7	29 (3)	10.3%
2009-2013	12 (4)	10	7	29 (4)	13.7%
2013至今	14 (4)	12	7	33 (4)	12%

說明:括號內為民主派議席數。

資料來源:轉引自(Yu 2013, 213)。

長期的政治結構上,整體的政體權力不平衡與內部選舉制度的限制造成澳門立法會的先天封閉性。民間的反對力量即使獲得全體泛民主派議員的支持,按理仍然無法否決政府議案。而且在審議〈離補法〉的當下,立法會還刻意加快整個審批過程。可以說,長期和短期的政治結構在此時沒有向抗爭者釋出任何政治機會。詳細情況將在第四部分討論。

二、貧乏的動員渠道：自我審查的主流媒體

動員過程的第一步是要透過宣傳,將動員框架與潛在支持者連接起來,從而才能產生共鳴,激發參與的動機;如此,宣傳渠道的可獲性至關重要。大眾媒體作為群眾獲知訊息的主要渠道,自然成為重要的動員資源之一,Gamson(1992)在“Talking

註① 政府以資助民間社團統合社會的模式在澳門由來已久。殖民時期,澳葡政府已經對民間社團進行經濟援助,主因當時實行二元分治的殖民政府,需要華人社團提供各種官方無法提供的社會服務,1966年左派暴動後,官方更需要利用經濟援助左派社團以換取政治穩定(婁勝華 2004, 321-330)。回歸後,這種資助制度仍然存在,不同職務的公共機構和官方基金會,向相關界別的民間社團提供不同程度的資助。

Politics”一書中，一再強調媒體論述如何影響人們的認知；在美國的平權、反核和反戰運動例子中，Gamson (1992, 81-82) 發現媒體論述對動員雖不是決定因素，但仍然舉足輕重，因為媒體論述有助抗爭議題的相互轉換。可以看出，這裡所說的議題轉換便是框架搭橋過程。更多的實證研究也指出媒體作為資訊擴散渠道，如何影響集體行動的出現。Myers (2000, 202) 對美國六十年代發生的城市暴動研究發現，暴動的傳染性 (infectiousness) 是被暴動的暴力程度所控制的，而暴力程度視乎媒體對事件的關注度；換言之，媒體創建了一個資訊網絡，越能接收暴動訊息的地區，越容易發生暴動。

媒體資訊作為資源對動員如此重要，但澳門主流媒體的報導立場卻長期傾向政府，其保守的報導風格不但不利抗爭者，甚至還存在自我審查的情況。以 2007 年勞動節遊行衝突事件為例，2007 年 5 月 1 日，2400 名主要來自建築業的本地失業工人走上街頭，抗議政府無力監管非法外勞的輸入，抗議者與警方因遊行路線的爭議最終觸發暴力衝突，警方開槍鎮壓導致誤傷路人。其後，各傳統社團紛紛登報譴責抗爭者，卻少有責備警方的開槍行為 (Ho 2011)。有學者在事後對所有澳門中文報章的報導內容進行分析，發現在事發後一個星期的報導中，57% 的報導傾向抨擊遊行人士，只有 9.7% 的報導傾向支持遊行人士，主流媒體更傾向將遊行事件標上：「破壞澳門國際形象、社會和諧等標籤」(林玉鳳 2011)。不但如此，有政府官員被揭發曾赴公共電視台「指導」是次報導內容 (正報 2007)。即使泛民主派議員曾要求政府正視相關媒體的自我審查問題 (市民日報 2009)。但主流媒體對監督公權力的程度仍經常被受質疑。¹²

為何澳門的主流媒體呈現政治保守傾向？原因之一在於 1991 年後，澳葡殖民政府便開始效法歐洲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向每間澳門報社實行現金補助制度，以保持澳門報紙的多元性；這種補助制度被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沿用，更有擴大的趨勢。如 1991 年每間報社的年度補助額為 6 萬元到 14.4 萬澳門元不等，然而到了 2015 年，本地所有 23 間紙本媒體，全部均接受由 15 萬到 100 萬元不等的年度金額補助 (譚志強 2010, 104)。倘媒體的經營不能獨立自主，其採編自主性亦足以惹人懷疑。¹³

重大社會衝突的報導惹來政府干預的個案、本地媒體對政府資源與資訊的高度依賴。以上因素均反映澳門的媒體環境如何不利抗爭者從事宣傳工作。澳門媒體可能存在廣泛自我審查的問題，在近年已受到國際記者聯會 (IFJ) 和美國人權委員會的持續關注 (Bureau of Democracy 2016; Woo 2015)。

抗爭者面對本地宣傳渠道的缺失，又面對不利的政治環境，卻仍在「反離補運

註 12 Yu and Chin (2012) 的田野研究也顯示，澳門的主流媒體存在自我審查的情況，很少媒體主動從事新聞調查，大部分所謂「事實」報導多來自官方版本，而親民主派的新聞卻鮮有登上主流媒體的主要版面。

註 13 相對來說，如果媒體並非完全依賴政府資助，其批判性也會較高。創立於 1944 年的《市民日報》是澳門第二份歷史最悠久的報章，1999 年回歸初期，該報被以經營葡京賭場致富的「賭王」何鴻燊收購。雖然該報仍然部分接受政府資助，卻因為擁有相對其他報章更獨立的資金來源，較能直接報導澳門政府的貪腐和民主派新聞 (譚志強 2010, 111)。但這一例子仍然只是傳統媒體中的少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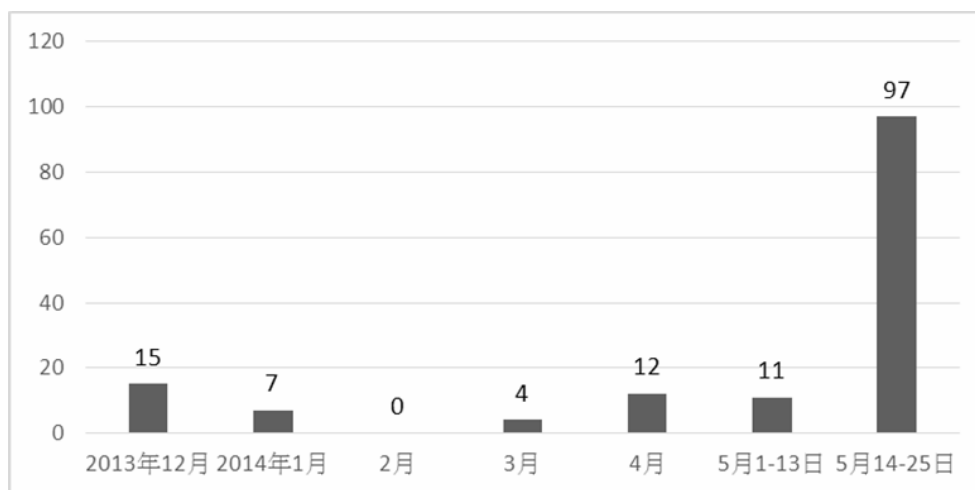
動」中促進了動員效果，他們依靠的是怎樣的宣傳渠道？

肆、運動中的動員與構框

一、運動的源起與過程

早在 2013 年 12 月初，法案已開始被本地媒體報導，然而內容只關注特首與官員的加薪幅度是否合理，仍未有輿論將法案與特權掛勾，更沒有提出任何撤回法案的訴求。不足半個月，法案在缺乏公眾諮詢的情況下，在立法會全體大會以 28 票贊成、3 票反對被一般性通過。接下來，只要經過立法會小組委員會的細則性討論，再交付立法會作全體最終表決，法案便正式生效，而負責細則討論的「第二常設委員會」，十位成員中只有一位在一般性表決時投下反對票。更甚者，有議員主動提到雖然目前正值政府換屆的敏感時機，卻認為在選舉前完善法案是更有責任、更正確的做法（市民日報 2013）。這樣的言論在當時竟然未激起任何主流輿論的批評，某程度說明在此時社會大眾仍未認知到法案的問題性，也未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從側面看，有著政治和輿論優勢的政府，似乎不認為正值換屆之時推出法案將可能帶來政治危機。而實際的情況是，本地四間主流媒體在 2014 年 1 月到 3 月間，有關該法案的報導合共只有 11 篇，甚至整個 2 月沒有任何一篇報導（見圖 1）。

圖 1 澳門主流媒體對「離補法」的報導量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澳門日報》、《華僑報》、《市民日報》和《濠江日報》。

直到 4 月 23 日，小組會議討論政府最新修改的法案文本內容，在最新文本中，主要官員的離任後補償金比率竟然由原薪酬 14%，大幅增加至 30%。基於官方大幅修改

具爭議的文本內容，泛民主派議員終於有所行動。4 月 28 日，直選議員高天賜和梁榮仔召開記者會，批評法案未經公眾諮詢是「不公平兼不公正」的行為，並公開要求政府撤回法案；次日，除本地媒體報導外（澳門日報 2014a），是次內容亦罕見地出現在香港的《東方日報》（2014b）和《太陽報》（2014a）的次要版面上；^④5 月初，泛民主派議員吳國昌和區錦新就法案進行公眾諮詢的要求遭小組會議否決，更有原投贊成票的議員公開批評法案內容缺乏合理性（市民日報 2014b；華僑報 2014）；民間方面則有基層公務員團體向政府遞交反對法案的請願信（市民日報 2014a）。民間組織的反對行動開始出現。

5 月 13 日，香港《東方日報》和《太陽報》以頭版方式報導事件，並以「自肥」、「濫用權力」、「黑箱作業」等相較本地媒體更激進的字眼來形容法案內容與政府的立法動機（太陽報 2014；東方日報 2014a）；次日，代表勞工團體的保守派議員也公開反對法案對離任官員的補償額過多（市民日報 2014e）。各民間組織開始進行街頭聯署等動員工作。當中，主要由本地青年組成的新興政治組織「澳門良心」在 20 日向立法會遞交反對法案通過的請願信，並同時宣布將在五天後（25 日）舉行以「反離補、反特權、反高官自肥」為名的集會遊行；此時亦有學者、工運團體和學生組織公開要求政府撤回法案（市民日報 2014d）。抗議行動在 5 月開始湧現。同月 21 日和 22 日，《東方日報》和《太陽報》再度頭版報導法案，其他香港報章如《信報》（2014）、《蘋果日報》亦跟進報導，並針對特首任期內免刑責的法案內容大力抨擊，將議題上升至「僭建基本法」、「一國兩制變三制」等論述層面，又訪問將發起遊行的「澳門良心」成員，增加反對行動的曝光率。

5 月 23 日，運動進入高潮，立法會突然宣布將議案提前至 27 日作最終表決，全體議員只有五天時間消化法案內容；而在議會內擁有席次的親政府社團「江門同鄉會」則宣布於「反離補遊行」同日，組織支持法案的反制運動（counter movement），企圖抵消反對運動的力量（澳門日報 2014）。顯然，只有數百人的反制運動無法對抗憤怒的大眾，討論超過半年的〈離補法〉仍然在最終表決的前三天（5 月 25 日）引發 20,000 人遊行。面對燃燒的民怨，儘管當局已立刻取消向議會提交的表決議程，嘗試對反對運動「滅火」，但 7,000 名憤怒的澳門人仍然在 27 日包圍立法會，要求政府完全「撤回」而非暫緩表決法案；最終，崔世安於 29 日的記者會上正式宣布撤回特權法案，並戲稱自己「雖然肥，但不會自肥」（澳門日報 2014b）。民意成功擋下惡法，更造就回歸十七年以來最大型的公民運動。（運動時間表見附錄二）

二、香港媒體作為動員渠道

本文認為，雖然有關法案的資訊早在 2013 年底出現，卻在次年的 5 月才迅速激化

註④ 對於該法案為何突然引起香港媒體關注的原因，目前確實沒有合理的解答。有受訪者認為是基於某些泛民主派議員與媒體的個人關係，但遺憾無法獲得這方面的資料。香港媒體的報導動機，確實是後續值得追問的問題（如基於個人關係或共同的價值觀等）。

為大型社會運動。香港媒體作為外部宣傳渠道，其所形成的動員結構（讀者群）不但有利組織者吸納支持者；而組織者又利用媒體論述資源重新進行構框，從而與潛在的參與者產生共鳴，香港媒體對於動員工作發揮了關鍵作用。若干間接和直接證據支持這樣的論點。

細繹回顧整個動員過程，民間反對行動主要在 4 月底開展，包括基層公務員請願、民間聯署、工運和學生團體等各種抗議行動。而主要運動組織「澳門良心」則是在議案表決的前一星期才宣布遊行（5 月 20 日），動員時間其實相當不足。相反，在 4 月前長達近五個月的議會小組討論過程中，沒有任何公開的民間反對行動。事實上，基於澳門動員環境的不利性，不少社運團體在當時並不看好動員效果：

我好記得，遊行前一晚我們估計只會有 1000 人左右，因為通常以 FB 活動的按 Likes 情況估計，約三分一[人會參加遊行]左右。所以[反離補]其實是不太重要的，我們當時只是想說，在歷史上留下證據，我們是有做事的（受訪者 E）。

而在媒體報導上，本地媒體的報導高峰期也同樣集中在 5 月，但後半個月（5 月 14 至 25 日）的報導次數卻是前半個月的 9 倍（見上圖 1）。某程度可說，大眾輿論對法案的關注是在 5 月 14 日才開始。而 5 月 13 日，則是香港媒體《東方日報》和《太陽報》首次以頭版對法案展開批評。香港媒體的報導似乎對民意產生了影響。如果這樣的假設合理，民意在每次香港媒體報導後，應該會產生明顯的變化，而社交媒體上的輿論反應則部分證明了這樣的推論。

網絡傳媒《愛瞞日報》（以下簡稱：《愛瞞》）是近年澳門受眾最多的新媒體，其在臉書（Facebook）的訂閱群眾接近 10 萬人，內容以本地新聞、評論和惡搞的政治議題為主。事實上，該報由澳門民主派組織「新澳門學社」所擁有，¹⁵遂成為澳門民主派陣營的唯一喉舌，在「反離補運動」中自然也是主要的動員渠道。表 2 呈現的是 4 月 25 日到 5 月 24 日遊行前天，發布在《愛瞞》臉書專頁上所有關於〈離補法〉和運動的貼文分析，包括「貼文數」、「獲得的「點讚總數」和當天「每篇貼文的平均點讚數」。數據顯示，在 4 月底到 5 月初當中，民主派議員呼籲市民關注法案的消息（4 月 25、5 月 4 日）、民主派議員要求法案公開諮詢卻遭小組會議否決的新聞（5 月 7 日），均無法獲得大眾的關注，三天的相關貼文平均只有約 200 次的點讚數。然而在 14 日平均點讚數卻突然增至 1500 次，當天的貼文標題是：

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睇咗（按：看了）今日《東方日報》嘅頭條，依個〈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最快月內就會由

註 15 據該報自介，《愛瞞日報》創立自 2005 年，版面和名稱仿照澳門主流報章《澳門日報》，以惡搞形式諷刺時弊為主，雖然受「新澳門學社」資助，但同時強調自身獨立性（愛瞞日報 2017）。「新澳門學社」創立自 1992 年，是澳門支援「六四運動」後誕生的政治組織，該社以中產菁英為主，在過去近 25 年一直是澳門標誌性的民主派組織，並持續在立法會擁有席次（Yu and Chin 2012）。

立法會全體作細則性表決。其實依單野（按：這件事）去年由立法會一般性通過後，大家似乎不明白所謂何事。」（愛瞞日報 2014）

在這篇貼文中，《愛瞞》不單轉載了香港媒體《東方日報》對法案的頭版報導，還呼籲市民以「一人一照反離補」的方式，將自拍照上傳至該專頁，從而動員群眾關注法案。同樣，5 月 21 至 22 日是香港媒體另一次的頭版報導，而《愛瞞》臉書專頁上的群眾反應也在 22 日和 23 日再次被激化，兩天的平均點讚數為 739.3 次和 797.3 次，與前幾天的數量相比產生明顯差別（前五天的平均點讚數只有 385 次）。事實上，《愛瞞》的負責人在日後也認同香港媒體對事件的催化作用，並直言在港媒報導後，反對法案的來稿評論和自拍照片才「塞爆」了《愛瞞》的收件箱。^⑩從事後來看，香港媒體對澳門輿論產生巨大影響力的原因，必須歸因於澳門社會對香港媒體的資訊依賴。

表 2 運動期間《愛瞞日報》臉書專頁分析

日期	貼文數	點讚 (likes) 總數	每篇貼文平均點讚數
4月25日	1	219	219
5月4日	1	178	178
5月7日	1	222	222
5月14日	1	1500	1500
5月16日	1	491	491
5月18日	2	691	345.5
5月19日	3	1036	345.3
5月20日	3	1121	373.7
5月21日	5	1849	369.8
5月22日	4	2957	739.3
5月23日	4	2829	797.3
5月24日	5	2380	47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根據一項澳門大眾媒體使用的追蹤調查顯示（見表 3），香港媒體在澳門的閱讀率一直占有相當比例。閱讀率最高的前五名日報中，香港媒體占三席，總比率由 2002 年的 58.4%，升至 2013 年的 93.2%；相反，雖然《澳門日報》仍維持首位，其閱讀率卻呈現下降趨勢，除該報和另一份本地免費報章《力報》外，其他 14 間本地日報則五名不入。網絡媒體和電視台也呈現相似情況。^⑪更甚者，在 2012 年的同類民調中，73%

註⑩ 《愛瞞》的負責人這樣評價香港媒體的作用：「那個五月初，眼見自肥法案步步進迫，鑄造『免死金牌』的奸計快將得逞之際，許多市民仍未知此一惡法的嚴重性。《愛瞞》決定發起『一人一照反離補』的行動……但任何行動在萌芽階段都是十分脆弱，初期反應並非如想像中熱烈……就在那時候，香港報章先後兩天以頭條報導事件，終於把反離補的情緒燃燒起來，成為全澳上下關注的『大新聞』（崔子釗 2015, 171-172）。」

註⑪ 在 2012 年另一次民調中，29.1%受訪者上網觀看網絡版的《蘋果日報》，而《東方日報》亦占有 17.7%，兩者成為全澳受眾最多的網絡媒體；電視台方面，受眾最多的頻道為香港《翡翠台》（80.3%），次位的《澳門電視台》則只有 55.3%（A. I.-f. Lam forthcoming）。

受訪者相信澳門媒體與澳門政府同一陣線，66%認為澳門媒體難與大眾交流。以上數據表明，香港媒體是澳門大眾重要的資訊接受渠道，而大眾對本地媒體則似乎投下了不信任票。

表 3 澳門大眾對媒體的使用狀況（%）

報章	2002年閱讀率／排名		2013年閱讀率／排名	
澳門日報（澳門）	88.40%	1	78.80%	1
蘋果日報（香港）	11.60%	4	44.20%	2
東方日報（香港）	34.00%	2	33.20%	3
力報（澳門）	--	--	25.40%	4
太陽報（香港）	12.80%	3	14.00%	5
華僑報（澳門）	5.80%	5	--	--

說明：是次民調為複選題，故比率相加會超過 100%。

資料來源：作者摘自（A. I.-f. Lam forthcoming）。

與之前提到 Myers（2000, 189）有關城市暴動擴散的研究類似，資源接收程度會成為暴動出現與否的影響因素，小城市注定會接收更多大城市的資訊，且在有接受共同媒體資訊的城市中會構成溝通網絡，暴動會更易被傳播。換到「反離補運動」的脈絡上，有關抗爭事件的資訊便在由香港媒體構成的動員結構下，快速傳播到澳門社會之中。一位在運動中公開反對法案的學生組織成員提到他是如何認知法案的不合理性：

到東方[日報]爆出新聞，有人說不如大家坐下來討論一下吧，看能做些什麼。其實看整篇新聞就會覺得不太合理，政府又解釋不清楚，當然東方[日報]頭條是很渲染……東方[日報]的報導是會詳細一些的，但我們都知道學社[按：新澳門學社，澳門民間組織]和議員都有講過，但我們和市民都好像沒留意。再來保皇黨那些議員的言論，被報導後就會覺得很不合理（受訪者 D）（粗體為作者所加）。

與在網絡上反映的民意關注變化相似，顯然不少人在港媒報導之前並不認為、也不關注法案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但當看到港媒的報導後，才驚覺法案的問題性。「周邊的人才開始討論，到後期網絡等各種事才被討論」（受訪者 B）。前澳門大學教授仇國平這樣評論香港媒體在事件中的角色：

「離補法」其實早在運動發生前半年已經推出，澳門的傳媒早有著墨報導，卻沒有引起市民多大關注。直到運動發生前半個月，香港的《東方日報》，突然對反離保的請願行動，高調地作出兩次頭版爆料，並以極負面的字眼形容〈離保法〉，輿論才開始驚覺事態嚴重……除非澳門出現較多市民欣賞的媒體，而該些媒體又能引起市民關注具爭議性的政治事件，否則大規模群眾運動難以重演（仇國平 2015, 234-235）。

從以上可知，無論在參與者對運動的主觀認知與大眾媒體受眾的情況所揭示，香港媒體對澳門大眾的輿論都有重要影響力，甚至超出了運動組織者的預想。用一位長期組織公民議政活動的運動參與者的話來說，即使並非完全認同《東方日報》的報導，但無可否認的是，東方的報導讓受爭議的法案內容更容易「進入尋常百姓家的討論範疇」（受訪者 G）。

三、太陽花作為劇碼採用

除了香港媒體外，在同年（2014 年）4 月剛結束的台灣太陽花學運，亦影響了澳門的反離補運動，唯其並非直接對澳門大眾產生影響，而是透過在地的運動組織者回饋至澳門大眾身上。具體可從「包圍立法會」中看到的太陽花因素：無論是「包圍」此一動作或是「立法會」作為遊行地點，以上的抗爭劇碼（repertoire）都不屬於澳門自回歸以來的主要抗爭形式（Ho 2011; Yu and Chin 2012）。然為何組織者在此時提出這樣的抗爭劇碼？發起遊行的「澳門良心」核心成員之一，提到太陽花運動如何影響他的抗爭理念：

雖然澳門傳統媒體大多報導負面新聞，但網路是自由暢通的，[資訊傳播]威力更強。當時[按：指看到台灣的學運]有種『恍然大悟』感覺，看到可以佔領立法院，真係從來無想像過可以這樣做，華人社會從未出現過，而且一樣都係年青人，好似產生相同特性（受訪者 A）（粗體為作者所加）。

現今發達的網際網絡技術不但擴大跨域資訊流動的可能性；更直接的事實是，這位年青的運動組織者，其實就畢業自台灣的大學，也曾參與台灣的反核運動（Lam 2014）。在 McAdam 和 Rucht（1993）有關跨國社會運動的研究中，關係渠道（relational channels）的建立對社運策略的擴散有其重要性，他們發現在美國留學的德國學生，直接將美國的社運議題和文宣利用在德國的社運之中，這樣的擴散例子亦同樣出現在台灣社運之間。¹⁸可以說，發生在澳門與香港大型社運之前的太陽花運動，確實對反離補運動當中的部分組織者產生了某程度的「啟蒙」作用。

除組織者的理念影響外，在「反離補」和後續行動的文宣中，不時能看到澳門社運組織借用台灣社運的抗爭標語：如「自己的小城自己救」、「自己的特首自己選」、「自己的政府自己救」等（見圖 2）。組織者直言，因為台灣的抗爭者已經在網路上提供了相關的標語生產器，其便直接借用來生產自己的標語（受訪者 A）。

註 18 2014 年 9 月起，香港同樣發生以學生為主體的大型社會運動，在社運初期曾主導運動的學生組織「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其領導層成員其實早在太陽花運動進行期間，就到過台北「觀摩學運的組織及分工安排」（湯惠芸 2014）。

圖 2 澳門社運中的標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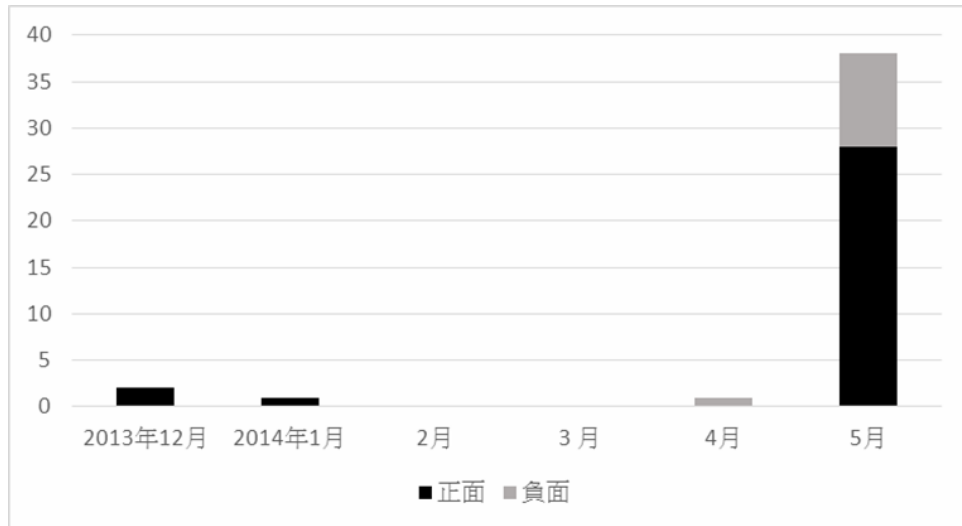
拒絕良心沉默 澳門人站出來

自己的特首 由自己選擇

資料來源：由受訪者提供。

然而，我們也不能過度將動員成果歸因於香港媒體的動員結構和台灣太陽花學運的論述資源，而應該關注既有的結構是如何被利用作動員的，因為結構內的群眾仍然可以選擇支持或反對運動；回顧本地主流媒體的態度，當香港媒體頭版報導後，本地受眾最多的《澳門日報》便企圖加大對法案的支持力度，其對法案的正面報導在整個5月期間都占有主導地位（見圖3）。但為何澳門人在此事上仍選擇不信任政府？

圖 3 《澳門日報》對法案的報導傾向



說明：判斷報導內容屬正負面的流程如下：（一）先摘取《澳門日報》由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5 月 25 日所有關於法案的報導，包括普通報導和評論文章共 42 篇。（二）根據文本內容進行判斷，內容為批評抗爭行動、支持立法者則歸於正面報導；支持抗爭行動、反對立法者則歸於負面報導；無法判定內容，或純粹報導政府方面回應的報導屬中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由「法案」到「自肥法案」：媒體與動員框架的合流

在動員過程中，當第一步的框架搭橋完成後，激發人們抗爭動機的步驟便是框架擴大（frame amplification）：組織者需要提出一個鼓舞人們起來行動的解釋框架，例如將運動塑造為要守衛某種價值或信念，或某種「現在不出來，以後站不出來」的悲觀主義（Snow et al. 1986, 469-471）。所以，媒體論述必須經過組織者的再論述才能發揮作用，用 Gamson (1992, 176-180) 的話來說：「大眾智慧有助將媒體論述與經驗認知搭建起來，從而產生整合去支持許多議題的構框。」簡而言之，我們必須了解組織者如何運用媒體論述，構框出一個能符合大眾認知，與大眾產生共鳴的動員框架，才能激發參與動機。

在「反離補運動」的動員論述中，組織者似乎吸取了香港媒體對〈離補法〉的各種論述，將政府的法案塑造為貪污，傷害澳門人利益，澳門人要站出來捍衛自身利益等動員論述，整個構框過程（framing process）如此開展（見表 4）：最初，官方對立法的原因和動機分別是「制度化建設考量」、「官員工作量與保障成正比」與「地區首長要獲得尊重和尊嚴」等（市民日報 2013a），但在港媒的主要報導中，法案不但被直接命名為「自肥法案」，烙印上不公義的名號，更以政府「缺乏公開諮詢和透明度，涉及濫用公權力」；而特首免刑責的法例則被指涉為「魔鬼條款」，其動機是要「令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三制」（東方日報 2014; 2014a）。緊接著，遊行組織的聲明便將遊行定義為

「反高官自肥法遊行」，又指特首免刑責是「特首變『國家元首』」，若法案過關將會是「另一次公共資源分配不公，製造特權階級，進一步撕裂社會。」（澳門良心 2014）。可以看出，港媒與社運組織都以「自肥法」先將法案重新命名，並將特首指涉為特權的具體象徵，而社運組織者又進一步，將特權構框為造成社會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進一步利用媒體論述去連結社會的現實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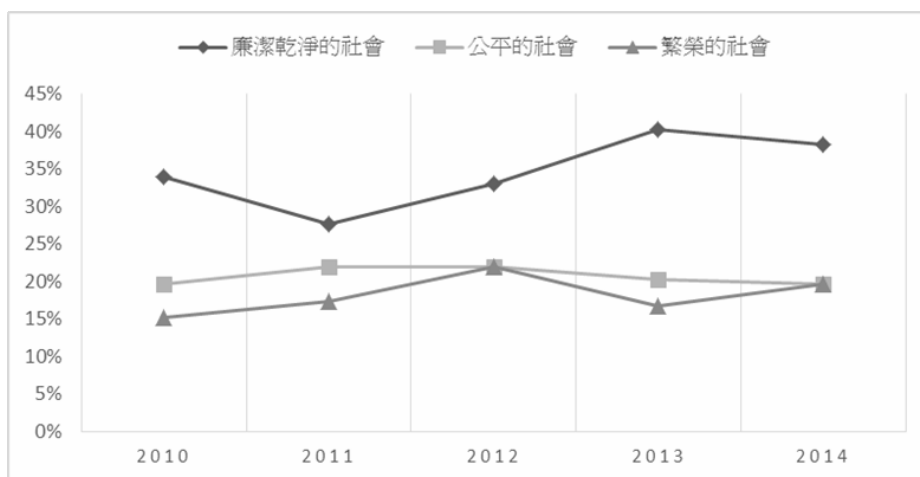
表 4 「反離補運動」的構框過程

	官方論述	香港媒體論述	社運組織論述
法案名稱	〈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	自肥法案	反高官自肥法遊行
立法目的	制度化建設考量	濫用公權力	製造特權階級
背後動機	平衡工作量與福利；地區首長應獲得尊重	一國兩制變一國三制	特首變國家元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相關報章內容。

據香港大學的年度民意調查顯示（見圖 4），相較於「繁榮」和「公平」的社會，澳門大眾最渴望一個「廉潔乾淨的社會」，反對派論述下的「特權、自肥」法案正正傷害了澳門人的核心關懷，嚴重打擊政府立法的正當性；一份針對反離補運動參與動機的研究報告也表明，四成受訪者的參與動機是因為法案的不公義，只有約兩成半的受訪者是基於同儕壓力和利益而參與運動的，而且越年輕的人越傾向以不公義作為抗爭動機（Chan 2015）；另一份針對台港澳青年政治行為的研究報告便印證了，18-35 歲表示有參與反離補運動的澳門受訪者比例，比 36 歲以上受訪比例多出超過兩倍（蕭新煌、鄭宏泰、尹寶珊 2016）。

圖 4 澳門人對社會的期望（2010~2014 年）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4）

情況如趙鼎新（2007）在論證八九學運的激進化原因相似，中國在經過 80 年代的改革開放後，社會對政權的正當性認知已由意識形態轉變為經濟和社會福利等績效成果，所以當學生的就業前景在市場化下不再有利，而政權仍緊抱意識形態時，國家和社會兩者對正當性的認知衝突便激化了運動。同樣地，正當性衝突出現在反離補運動中。當澳門社會大眾認為政府做出最不能容忍的貪腐行為時，社運組織的特權論述便大大激化了人們行動的動機，而這些論述的資源則來自香港媒體的報導。

五、政治機會與否？

必須說明，雖然 2014 年特首崔世安正尋求連任，這種相對的政治不穩定性在主流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觀點之下，可能被視作動員的關鍵因素。^⑩我們不否認特區政府為求順利連任，可能會更易接受抗爭者的訴求，但抗爭者是否認知到政治機會的存在卻值得被懷疑。以下三點可以說明此一論點：

第一，政治機會並未開放。在運動過程中，沒有任何證據指出特首可能有「落馬」的危機，因為澳門政區政府並非民選政府，特首選舉不需面對廣泛選民的壓力，而只需向北京政府和由 600 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交代。在整個事件中，至少北京從未公開批評特區政府或〈離補法〉的修法。^⑪故認為特首撤回法案是因為政治生涯的考量仍缺乏直接證據。

第二，抗爭者並未積極利用這一「主觀的」政治機會。在「澳門良心」的遊行文宣中，我們看不到任何有關特首尋求連任或政府即將換屆的論述。倒是在 20,000 人遊行完結後，組織者才公開將運動與連任議題連結，表明「崔世安不撤案，我們就撤換崔世安」（正報 2014）。可以說，主要組織者是在運動的後期才認知（或利用）到政治機會的主觀存在。

最後，媒體應被視為資源而不應被視為政治機會。儘管香港媒體在報導中批評政府在現屆任期結束時推動法案，是「予人『貪』及『幫自己搵著數（按：撈好處）』的觀感」；而本地媒體也在運動後期出現一些批評政府換屆時強推法案的觀點（市民日報 2014; 2014c）。而在相關文獻中，部分論點認為媒體對運動的開放也應被視為政治機會的元素之一，但本文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媒體既不屬於正式的政治結構，將媒體視為政治機會也會與資源動員論產生衝突，過度擴大「政治機會結構」的解釋性只會讓理論出現負載（Gamson and Meyer 1996; 何明修 2005, 137-138）。

基於此，特首連任作為政治機會是否促進了運動的進展是值得懷疑的，因為沒有任何強烈證據證明抗爭者和抗爭目標是圍繞在這一議題上進行互動。誠言媒體的論述

註⑩ 無可否認，相對穩定的政治結構始終對社會運動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力，因為從事抗爭行動始終有著成本考量，例如抗爭者對客觀政治結構的認知便影響抗爭者使用的手段和抗爭結果（Kitschelt 1986; Kriesi, Koopmans, Duyvendak, and Giugni 1992）。

註⑪ 北京官方雖然從未就事件表態，但官方媒體《新華社》卻曾在 5 月 26 日轉載一篇題為〈澳門擬定特首可終身吃『皇糧』 獲發在職月薪百分之七十〉的文章，但這已是兩萬人遊行的後一天，故不能說是官方的回應強化了民衆的參與動機，而這也是官方媒體唯一對事件的報導（蘋果日報 2014）。

確實涉及了特首連任的議題，但如此只會強化法案的不公正性（unjustness），並非直接作用在運動中。如 McAdam（1996）等人所言，主觀認知和客觀機會並非相互獨立，只有在行動者成功捕抓並分享其意義時，機會才會被成功轉化。無論如何，事後看來澳門抗爭者確實運用香港媒體的論述進行了成功的動員構框，而這樣的資源利用同樣在兩年後的運動中再次出現。

伍、2016 年：反特權運動的延續

一、更有效率的動員過程

2016 年 5 月 5 日，本地媒體報導廣州暨南大學獲澳門基金會提供一億人民幣發展經費，但澳門基金會為政府半官方機構，其資金來源與政府收入掛勾，即其補助的一億元仍屬公帑；其後，網上披露特首崔世安既是暨南大學校董，又屬澳門基金會主席，隨即被輿論質疑其有「黑箱作業」和「利益輸送」之嫌，而同屬反離補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則迅速展開聯署和請願等抗爭行動（市民日報 2016a；華僑報 2016；濠江日報 2016）。

四日後，組織宣布將於一星期後發起遊行，要求政府「撤回一億捐款」；與「反離補」相同，除以「新澳門學社」為首的主要反對派外，勞工團體、青年組織共 14 個民間團體亦加入遊行之列，反對運動在事件引發的一星期內快速形成（市民日報 2016；正報 2016a；澳門日報 2016）。當反對派宣布遊行後，香港媒體如《明報》、《蘋果日報》和《東方日報》亦有持續報導事件，但篇幅卻沒有「反離補」般持續且詳盡（明報 2016；東方日報 2016；蘋果日報 2016）。

然而，政府的反制行動比兩年前更為迅速：特首先在遊行前夕主動向社會道歉，卻未答應撤回捐款、又同時要求本地媒體刻意淡化事件報導、並在遊行前夕突然更改遊行集合地點，企圖干預遊行進行（正報 2016；2016b；澳門日報 2016a）。但面對比起「反離補」時更不利的動員條件，組織者最終仍動員超過 3000 人參與遊行，是六年來四大遊行之一。^②

二、由被動化作主動的動員機制

與兩年前相同，是次遊行同樣針對特首有特權之嫌，同樣以「撤回」作為主要訴求之一，亦是相同的人員負責組織動員工作；卻面對本地媒體刻意淡化、政府干預等更不利的動員條件。縱然香港主流媒體的關注幅度有所減少（未有媒體進行頭版報導），但只要動員渠道仍然存在，配合抗爭者適當的動員論述，就能維持一定程度的動

註② 自 2010 到 2016 年起，參與規模最大的遊行包括：2013 年的「反對輸入外地莊荷」遊行共 3000 人、2014 年的「反離補遊行」共 20000 人、2015 年的「動保法立法遊行」共 3000 人和這次「暨大一億」事件（市民日報 2016）。

員效果。實際上，香港有不少網絡媒體關注事件，其中一位組織者便說：

2014 年前好少主動聯絡[香港媒體]，多數都係澳門有選舉[他們]才會關注。之後有自身價值後[按：反離補事件的成功]，才開始主動聯絡[香港媒體]，但通常都係大型行動才主動聯絡。主要媒體係《蘋果日報》、網媒有《立場新聞》、《HK01》、《熱血時報》等。但真的不會找《東方日報》，佔中個時都睇得到係鬼啦（按：即指東方的報導立場並非親香港民主派）（受訪者 A）。

這一動員機制的變化過程是：組織者認同「反離補運動」當中香港媒體所產生的作用，故在此後的大型抗爭行動中，開始主動聯絡這一外部動員渠道。即使本地的動員環境被高度受限，依靠香港媒體，抗爭者能夠獲得關鍵的動員網絡作為資源；甚至由過去被動地接受香港報導，轉為主動向香港媒體拋出議題，回過頭來再由澳門人信賴的香港媒體將抗爭資訊傳回澳門，^②最終形成動員網絡這一動員過程的關鍵步驟。

表 5 香港媒體對澳門動員的重要性

	政治結構	抗爭者	抗爭目標	香港媒體報導強度	動員結果
反離補運動	封閉	民主派	特首	強 (媒體持續報導)	高 (兩萬人)
暨大一億事件	封閉	民主派	特首	較弱 (沒有持續且頭條報導)	中 (三千人)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陸、總 結

近年台灣和香港的公民社會互動持續升溫，在正式政治上甚至已組成某種鬆散的政治聯盟（時代力量 2017）。這樣的現象，部分學者將其歸因於台港社會共同面對來自北京的政經壓力所激發的「趨同性」，如對「本土」和「自決」的修辭構框、「佔領」作為抗爭劇碼的運用與頻繁的民間交流等（Kaeding 2015；吳介民 2014）。無疑地，澳門的抗爭者在面對本地不利的政治結構與貧乏的動員資源時，也開始積極運用香港與台灣的抗爭資源從事自身的反對運動。在 2014 年澳門「反離補運動」和後續例子中，澳門的抗爭者運用香港媒體對澳門大眾的輿論影響力，以「出口轉內銷」的形

註② 值得說明的是，在受訪者的認知中，因為《東方日報》在 2014 年香港佔領運動中的親政府表現，而被視為不被信任的媒體。但並不影響本研究的主要論點，原因在於：首先，以主動聯絡香港媒體作為動員渠道的機制在 2014 年反離補運動時仍未形成，故抗爭者對媒體的認知並不會反映在 2014 年的運動上；其次在事實上，大規模的香港佔領運動發生於 2014 年 9 月底，此時澳門「反離補運動」已結束多個月，故我們亦無法排除抗爭者對《東方日報》的認知是在反離補運動結束後，才發生轉變的可能性。

成將香港媒體作為自身的動員渠道，成功激發大眾不滿從而有助後續動員論述的構框；並同時從台灣抗爭者中涉取論述資源與抗爭劇碼。

然而，澳門抗爭者的「外部動員機制」與台港的互動模式仍有所差異。前者在涉取台港的論述資源時並不強調對北京的抗拒性或所謂「本土、自決」等修辭，而是策略性地強調能與澳門大眾認知產生共鳴的動員論述（如「特權、腐敗」）進行構框。即使澳門的抗爭者實際上可能認同港台對民主追求的價值（如受訪者對《東方日報》親政府立場的排斥），但其在被賦權的過程中，能夠彈性地選擇最適合本地環境的抗爭策略，才是動員機制發揮作用的關鍵。這種弱勢抗爭者的「雙面性」，在中國大陸的宗教人權抗爭中亦同樣出現（王韻 2015）。

除此之外，台灣與香港在動員機制中的角色亦存在差異，並由此引申出一個有關「抗爭政治」理論預測的後續觀察。「規模轉移」（scale shift）是 McAdam（2001）等人在其經典著作中提出的其中一個分析過程。他們認為抗爭規模的擴大，或甚至形成所謂跨國抗爭，必須先由兩個路徑所啟動，即由「中介者」（brokerages）將彼此互不相干的抗爭行動聯絡起來；另一路徑則為信息的擴散（diffusion）。然而，以「中介者」為主的運動似乎較有可能發展為跨國抗爭，因相對擴散，以人或組織等實際互動交流為基礎的中介連結將會更持久。

在澳門的例子中，組織者因為自身與台灣公民社會的既有關係，而產生抗爭理念的轉變並應用到澳門，即類似「中介者」的角色；另一方面，香港媒體對抗爭的作用無疑是信息的傳遞與擴散。也就是說，雖然在反離補運動當中，香港媒體的動員作用似乎要較台灣來得重要。^②但無論如何，「規模轉移」的若干條件確實已在澳門出現，故澳門的社運會否與台港兩地發展為跨國社會運動或所謂「跨國倡議網絡」（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Risse and Sikkink 1999; Tarrow 1998, 184-189），既是後續研究值得關注的現象，也是關注兩岸四地公民社會發展所不能忽視的面向。

*

*

*

（收件：106 年 3 月 10 日，接受：107 年 1 月 17 日）

註 ② 有讀者可能認為台灣因素相較香港顯得相形見绌，甚至可被忽略。但本文認為，來自理念啟蒙的影響力是無法估量的，而關係一旦出現（至少在本文個案中），便會有持續變化的動力（無論增強或減弱），故台灣因素的討論有其重要性，例如在後續研究中，研究者可以觀察澳門公民社會的變化是否受在地抗爭者與香港和台灣關係的強弱變化所形塑；驗證有關跨國抗爭理論中「規模轉移」的相關命題等，這些理論延伸都必須建基於台港因素在澳門的根本差異上。

附錄一：受訪者一覽表

代號	受訪者身分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A	「澳門良心」成員、「新澳門學社」前理事長	2016/06/02	台灣
B	「學問公民」成員	2016/08/01	澳門
C	「學問公民」成員	2016/08/01	澳門
D	「學問公民」成員	2016/08/01	澳門
E	「青年動力」成員	2016/10/15	台灣
F	「公民門徒」成員	2017/02/07	澳門
G	「公民力量」理事長	2017/02/15	澳門

附錄二：「反離補運動」時間表

日期	事件
2013年	
12/6	本地媒體開始報導〈離補法〉內容。
12/16	法案在民主派反對下獲立法會一般性通過，進入小組細則性討論階級。
2014年	
1/24	立會小組內有意見認為法案條文欠缺清晰。
1/28	媒體報導法案除主要官員加薪和離任補償外，特首還有任內刑事豁免權。
3/20-21	小組討論官員各種可能性的補償方案。
4/23-25	小組就高官離薪月薪和普通官員離薪月薪的加幅僵持不下。
4/28	泛民主派議員高天賜、梁榮仔公開要求撤回法案
4/29	香港《東方日報》和《太陽報》首次報導事件。
5/4-5	泛民主派議員吳國昌、區錦新要求法案重新諮詢但被議會駁回。
5/6	街坊總會議員何潤生公開批評法案。
5/12	首次民間團體（公職人員協會）就反對法案向政府請願。
5/13	《東方日報》頭版報導事件。
5/14-15	有學者和代表勞工的議員關翠幸、李靜儀公開批評法案。
5/16	民間組織「新澳門學社」舉行民間聯署行動反對法案。
5/20	民間組織「澳門良心」宣佈5月25日舉行「反離保、反特權」遊行。
5/21	香港各大媒體再度報導事件並宣傳遊行資訊。
5/23	議會決定加快審批法案進度，決定於27日進行最終表決。
5/24	宗族社團「江門同鄉會」宣佈25日舉行遊行支持法案。
5/25	兩萬人參與遊行，包括公務員、學生、教師、賭場員工等，為回歸後最大型社會運動；行政會召開緊急會議要求法案重提小組審議，企圖滅火。
5/26	新華社報導「澳門擬定特首可終身吃『皇糧』」；同日，崔世安請求刪除27日立法會表決議程。
5/27	「澳門良心」再動員七千名市民包圍立法會，認為法案「無需暫緩，馬上撤回」。
5/29	特首崔世安宣佈撤回法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蘇嘉豪 2015, 32-41）。

Mobilizing with the External Forces: An External Mechanism of Mobilization within the Anti-Welfare Package Movement in Macau

Chi-Fai LIO

MA,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ivil society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has been vibrant in recent years. Many researchers aim to identify this phenomenon via comparative and conceptual approaches, especially concentrating on the unexpected social movements that occurred during 2014 in these three respective places. However, few studies attempt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ve processes of such movements. To fill the gap, this article draws on the Anti-Welfare Package Movement in Macao in 2014 as a case study to demonstrate how movement organizers flexibly and successfully framed the mobilizing discourses by using various articles from Hong Kong media and The Sunflower Movement in Taiwan; thereby, enhancing the mobilization within an unfavorable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media environment. This initiative process seems to become a mechanism for playing a role in subsequent protests.

Keywords: Anti-Welfare Package Movement,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Social Movements,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u

參考文獻

- Woo, Serenade, 2015, 〈中國的大傳媒牆：爭取自由〉, <https://www.docdroid.net/m5HERKT/123.pdf#page=2>, 查閱時間：2017/08/15。Woo, Serenade. 2015. “China de da chuanmeiqiang: zhengqu ziyou” [The Great Wall of Media in China: Fighting for Freedom]. (Accessed on August 15, 2017)
- 仇國平, 2015, 〈反離保會否重演?〉, 蘇嘉豪編, 《撤! 還記得嗎?》: 232-236, 香港: 嘉濤宮。Chou, Bill. 2015. “Fanlibao huifou zhongyan?” [Will The Anti Privilege Movement be repeated?]. In “*Che! hai jide ma?*” [*Withdraw! Rememberable?*], ed. Sulu, Sou. Hong Kong: Kato Kung Publisher.
- 太陽報, 2014, 〈澳門修例益高官, 被轟自肥好醜陋〉, 5 月 13 日。The-Sun. 2014. “Macao xiuli yi gaoguan beihong zifei haochoulou” [Macau Amendments Benefits Officials, Which be Blamed Dirty]. May 13.
- 太陽報, 2014a, 〈議員促撤離任高官保障法〉, 4 月 29 日。The-Sun. 2014. “Yiyuan cuhe liren gaoguan baozhan fa” [Congressman Asked for Withdraw the Privilege Law]. April 29.
- 王韻, 2015, 〈國內維權、國際賦權, 與跨國倡權: 基督新教的跨國倡議運動與兩岸三地的宗教人權〉, 《政治學報》, 59: 55-80。Wong, Ray. 2015. “Guonei weiquan, guoji fuquan, yu kuaguo changquan: jidu xinjiao de kuaguo changyi yundong yu liangan sandi de zongjiao renquan” [Making Transnational Empowerment Possible: Protestant Human Rights Movements in Hong Kong, China, and Taiwa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9:55-80.
- 市民日報, 2009, 〈澳廣視領導被指干預編採〉, 7 月 9 日。Shimin Daily. 2009. “TDM lingdao beizhi ganyu biancai” [TDM Leader was Accused to Editorial Intervention]. July 9.
- 市民日報, 2013, 〈政府領導層加人工 10%, 特首基本月薪酬 27 萬元, 候任離任可享津貼〉, 12 月 7 日。Shimin Daily. 2013. “Zhengfu lingdaoceng jia rengong 10% teshou jiben yuexin chou 27wan yuan houren liren kexiang jintie” [Government Leaders Add 10% Salary, Basic Monthly Salary of Chief Executive will Arrived at 27 Million Dollar and Those Designate and Outgoing can Share Allowance]. December 7.
- 市民日報, 2013a, 〈候任離任特區首長需建制度保障〉, 12 月 19 日。Shimin Daily. 2013a. “Houren liren tequ shouzhang xujian zhidu baozhang” [Designate and Outgoing Chief Executive Should Have System Protection]. December 19.
- 市民日報, 2014, 〈公民力量: 離補法案不公平不公義〉, 5 月 26 日。Shimin Daily. 2014. “Gongmin liliang: libu faan bugongping bugongyi” [Macao Civic Power: The Privilege Law is Unfair and Unjustice]. May 26.
- 市民日報, 2014a, 〈公職協會遞信反對離任補償法〉, 5 月 13 日。Shimin Daily. 2014a.

- “Gongzhi xiehui dixin fandui liren buchanga” [Civil Servants Association Petition to Against the Privilege Law]. May 13.
- 市民日報，2014b，〈何潤生：離任補償差距大無準則〉，5 月 6 日。Shimin Daily. 2014b. “Ho Ionsang: liren buchang chajuda wuzhunze ” [Ho-Ionsang: There is no Standard for the Outgoing Allowance]. May 6.
- 市民日報，2014c，〈梁啓賢：強行通過離補方案有管治危機〉，5 月 25 日。Shimin Daily. 2014c. “Liang Qixian: qianghang tongguo libu fangan you guanzhi weiji” [Liang-Qixian: Force to Passed the Law Should Made a Governance Crisis]. May 25.
- 市民日報，2014d，〈學社街頭簽名冀撤離職補償法案〉，5 月 17 日。Shimin Daily. 2014d. “Xueshe jietou qianming ji chelizhi buchang faan” [New Macau Association Running a Public Joint for Withdraw the Privilege Law]. May 17.
- 市民日報，2014e，〈關翠杏李靜儀反對離任補償增至 30%〉，5 月 14 日。Shimin Daily. 2014e. “Kwan Tsuihang, Lei Chengi fandui liren buchang zengzhi 30%” [Kwan and Lei Against the 30% Outgoing Allowance]. May 14.
- 市民日報，2016，〈三千人遊行促撤回暨大一億資助〉，5 月 16 日。Shimin Daily. 2016. “Sanqianren youhang cu chehui jida yiyi zizhu” [Thousands of People Marched Which Promote for Withdraw the JNU’s 100 Million Donations]. May 16.
- 市民日報，2016a，〈兩團體遞信促撤回暨大 1 億捐款〉，5 月 10 日。Shimin Daily. 2016a. “Liang tuanti dixin cu chehui JNU 1yi juankuan” [Two Groups Petition to Withdraw the JNU’s 100 Million Donations]. May 10.
- 正報，2007，〈派員到澳門電視台插手特首回應五一新聞編寫工作：傳協抗議新聞局干預新聞自由〉，5 月 12 日。Cheng Pou. “Paiyuan dao TDM chashou teshou huiying wuyi xinwen bianxie gongzuo: Chuanxie kangyi xinwenju ganyu xinwen ziyou” [Macau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Blamed the Macau Social Media Office that Intervenes in Press Freedom]. May 12.
- 正報，2014，〈守護澳門七千人圍立會促撤案〉，5 月 28 日。Cheng Pou. 2014. “Shouhu Macao qiqianren weilihui cuchean” [7000 Macao People Surrounded The and Clamed to Withdrew the Privilege Law]. May 28.
- 正報，2016，〈傳協譴責黑手干預暨大報道〉，5 月 14 日。Cheng Pou. 2016. “Chuanxie qianze heishou ganyu JNU baodao” [Macau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Blamed the Intervention of JNU Reports]. May 14.
- 正報，2016a，〈學社周日發起遊行〉，5 月 10 日。Cheng Pou. 2016a. “Xueshe zhouri faqi youhang” [New Macau Association Organize a Demonstration on Sunday]. May 10.
- 正報，2016b，〈學社遊行改華士古花園集合〉，5 月 12 日。Cheng Pou. 2016b. “Xueshe youhang gai huashigu huayuan jihe” [The Demonstration Location of New Macau Association was Change to Jardim de Vasco da Gama]. May 12.
- 何明修，2004，〈文化，構框與社會運動〉，《臺灣社會學刊》，33：157-199。Ho, Ming-

- sho. 2004. “Wenhua , goukuang yu shehui yundong” [Culture, Framing and Social Movement]. *The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157-199.
- 何明修，2005，《社會運動概論》，台北：三民。Ho, Ming-sho. 2005. *Shehui yundong gailu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 Taipei: San Min.
- 何明修，2006，《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台北：群學。Ho, Ming-sho. 2006. *Luse minzhu: Taiwan huanjing yundong de yanjiu. [Green Democracy: A Study on Taiwan'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 何明修，2017，〈第三勢力與傘兵：比較台港站領運動後的選舉參與〉，《中國大陸研究》，60（1）：58-86。Ho, Ming-sho, 2017. “Disan shili yu sanbing: bijiao Taiwan-Hong Kong zhanling yundong hou de xuanju canyu” [The Third Force and Umbrella Soldiers: Comparing the Elections of Taiwan after the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0（1）：58-86.
- 吳介民，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台北：左岸文化。Wu, Jieh-min. 2012. *Disanzhong China xiangxiang. [Looking at China: the Third Way]*. Taipei: RiveGauche.
- 吳介民，2014，〈「中國因素」氣旋下的台港公民抵抗運動〉，謝政諭等編，《東亞地區的合作與和》：130-144，台北：前衛。Wu, Jieh-min. 2014. “‘China yinsu’ qixuan xia de taigang gongmin dikang yundong” [Taiwan-Hong Kong Civil Resistance Movement under the China Factor], eds. Chen-Yu Hsieh. Taipei: Avanguard.
- 明報，2016，〈崔世安三位一體：集團式輸送民脂民膏〉，5月12日。Ming Pao. 2016. “ChuiSaiOn sanwei yiti: jituanshi shusong minzhi mingao” [Chiu's Trinity, group corruption]. May 12.
- 東方日報，2014，〈心虛！澳門修例設保護罩，特首任內免刑責，如同僭建基本法，一國兩制變三制？〉，5月21日。Oriental Daily. 2014. “Xinxu! Macao xiuli she baohuzhao, teshou rennei mian xingze, rutong jianjian jibenfa, yiguo liangzhi bian sanzhi?” [Guilty! Macao Chief Executive Amendment Provided Protective Cover any Criminal Liability. Is it One Country but Three System?]. May 21.
- 東方日報，2014a，〈特首一世咬糧、九官離職厚酬、醜陋！澳門政府修例自肥〉，5月13日。Oriental Daily. “Teshou yishi yaoliang, jiuguan lizhi houchou, choulou! Macao zhengfu xiuli zifei” [Shared the Allowance for Hold Life, Ugly! The Macao Government Amendments for the Officials]. May 13.
- 東方日報，2014b，〈議員促撤離任高官保障法案〉，4月29日。Oriental Daily. 2014b. “Yiyuan cuce liren gaoguan baozhang faan” [Congressman Claimed to Withdrew the Privilege Law]. April 29.
- 東方日報，2016，〈周日遊行促撤暨大億元捐款〉，5月12日。Oriental Daily. 2016. “Zhouri youhang cuce JNU yiyuan juankuan” [Demonstration for withdrew the donation on Sunday]. May 12.
- 林玉鳳，2011，〈媒體、身分認同與公民社會〉，第8屆「媒介與環境」國際學術研討

- 會，天主教輔仁大學傳播學院。Lam, Agnes. 2011. “Meiti, shenfen rentong yu gongmin shehui” [Media, Identity and Civil Socie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dia and Environment”. Taipei: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信報，2014，〈澳門政府擬立法：豁免在任特首刑責〉，5 月 22 日。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Macao zhengfu ni lifa: huomian zairen teshou xingze” [The Macao Government Intends to Legislate to Exempt any Officer from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May 22.
-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4，〈澳門週年調查〉，<https://www.hk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macau/>，查閱時間：2016/6/21。The Public Opinion Programme. 2014. “Macao zhounian diaocha” [Macao Annual Survey]. (Assessed on June 21, 2016).
- 時代力量，2017，〈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會後新聞稿〉，<https://www.newpowerparty.tw/news/%E5%8F%B0%E7%81%A3%E5%9C%8B%E6%9C%83%E9%97%9C%E6%B3%A8%E9%A6%99%E6%B8%AF%E6%B0%91%E4%B8%BB%E9%80%A3%E7%B7%9A%E6%9C%83%E5%BE%8C%E6%96%B0%E8%81%9E%E7%A8%BF2017-6-12>，查閱時間：2017/08/15。New Power Party. 2017. “Taiwan guohui guanzhu Hong Kong minzhu lianxian huihou xinwengao” [Press release: the United of Taiwan Congress Concerns Hong Kong Democracy]. (Accessed on August 15, 2017).
- 婁勝華，2004，《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Lou, Sheng-hua. 2004. Zhuanxing shiqi Macau shetuan yanjiu: duoyuan shehui zhong fatuan zhuyi tizhi jixi. [The Study of Macau Associations During the Transformed Period- An Analysis of Corporatism in Pluralistic Society]. Guangdong: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崔子釗，2015，〈愛瞞有感：澳門，不要再瞞下去〉，蘇嘉豪編，《撤！還記得嗎？》：171-176，香港：嘉濤宮。Cui, Zi-zhao. 2015. “Aiman yougan: Macau, buyao zai man xiaqu” [Macao Concealers Reflection: Macau, do not Conceals More]. In “*Che! hai jide ma?*” [Withdraw! Rememberable?], ed. Sulu, Sou. Hong Kong: Kato Kung Publisher.
- 張曉明，2011，〈為什麼說澳門不是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在「澳門基本法高級研討班」結業典禮上的講話〉，《一國兩制研究》，10：1-5。Zhang, Xiao-ming. 2011. “Weishime shuo aomen bushi shihang ‘sanquan fenli’ de zhengzhi tizhi? zai ‘Macao jibenfa gaoji yantaoban’ jieye dianli shang de jianghua” [Why Separation of Powers doesn’t Run in Macao? Speech at Graduation Ceremony of Advanced Workshop of Macao]. *Academic Journal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acao) 10: 1-5.
- 湯惠芸，2014，〈香港學生參考台灣太陽花學運〉，<http://www.voacantonese.com/a/hong-kong-observers-on-taiwan-occupy-movement/1892846.html/>，查閱時間：2016/10/19。Tang, Hui-yun. 2014. “Hong Kong xuesheng cankao Taiwan taiyanghua

- xueyun” [Hong Kong Students Refer to the Taiwan Sunflower Student Movement]. (Assessed on October 19, 2016).
- 華僑報，2014，〈吳區兩議員反對予離任高官雙重補貼，建議展開為期一個月諮詢〉，5月5日。Vakio Daily. 2014. “Wu Au yiyuan fandui yu liren gaoguan shuangzhong butie, jianyi zhankai weiqi yigeyue zixun” [Wu and Au Who Two Congressmen Against the Double Allowance of Outgoing Officials, Suggested to Start a Month Consultation]. May 5.
- 華僑報，2016，〈特區政府通過基金會向暨大提供一億元建設經費〉，5月5日。Vakio Daily. 2016. “Tequ zhengfu tongguo jijinhui xiang JNU tigong yiyiyuan jianshe jingfei” [Government Through the Foundation to Donated 100 Million dollar for JNU]. May 5.
- 愛瞞日報，2014，〈愛瞞行動〉，<https://www.facebook.com/macauconcealers/photos/a.158212900914486.37247.153478958054547/649992035069901/?type=3&theater>，查閱時間：2017/08/15。Macau Concealers. 2017. “Aiman hangdong” [The Concealers Action]. (Assessed on August 15, 2017).
- 愛瞞日報，2017，〈關於〉，https://www.facebook.com/pg/macauconcealers/about/?ref=page_internal，查閱時間：2017/08/15。Macau Concealers. 2017. “Guanyu” [About]. (Assessed on August 15, 2017).
- 趙鼎新，2007，〈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Zhao, Ding-xin. 2007. *Guojia, shehui guanxi yu baji Beijing xueyu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Hong Kong: CUHK.
- 澳門日報，2014，〈江門會今巡遊挺離補法〉，5月25日。Macao Daily News. 2014. “Jiangmenhui jin xun you ting libufa” [Demonstration by Jiangmen Communal Society for support the privilege law]. May 25.
- 澳門日報，2014a，〈高天賜梁榮仔促撤官員離任補償法案〉，4月29日。Macao Daily News. 2014a. “Gaotianci, Leongvengchai cu che guanyuan liren buchang faan” [Countiho, Leong-Vengchai Claimed to Withdrew the Privilege Law]. April 29.
- 澳門日報，2014b，〈崔承諾保障得益全數捐慈善「我肥，但不自肥」〉，5月30日。Macao Daily News. 2014b. “Chui Saion baozhang deyi quanshu juan cishan ‘wo fei, dan bu zi fei’” [Chiu Promised that the Interests should be Donated for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I’m Fat, but no Enrich’]. May 30.
- 澳門日報，2016，〈三團體促交代捐款暨大〉，5月10日。Macao Daily News. 2016. “San tuanti cu jiaodai juankuan JNU” [Three Groups Asked JNU to Explain the Donation]. May 10.
- 澳門日報，2016a，〈指澳基會全按既定制度程序資助暨大，崔：一人三角無左交右〉，5月12日。Macao Daily News. 2016a. “Zhi Ao Ji Hui quanan jiding zhidu chengxu zizhu NJU, Chui: yiren sanjiao wuzuo jiaoyou” [Claimed that the Donation was Totally

- Legal, Chui: There was No Illegal]. May 12.
- 澳門立法會，2016，〈活動報告〉，http://www.al.gov.mo/cn/cn_main.htm，查閱時間：2016/6/21。Macao Legislative Council. 2016. “Huodong baogao” [Activity Report]. (Accessed on June 21, 2016).
- 澳門印務局，1999，〈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http://bo.io.gov.mo/bo/i/1999/leibasica/index_cn.asp，查閱時間：2016/10/19。Macao Government Printing Bureau. 1999.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Macao tebie hangzhengqu jibenfa” [Basic Law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ccessed on October 19, 2016).
- 澳門良心，2014，〈澳門良心要求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反離補、反特權、撤惡法〉，<https://goo.gl/VsPz5N>，查閱時間：2016/6/21。Macao Conscience. 2014. “Macao liangxin yaoqiu lifahui dier changshe weiyuanhui fanlibu, fantequan, cheefa” [Macao Conscience asked the Second Standing Committee of Legislative Council to Against the Complement, Privileges and Withdrew the Bad Law]. (Accessed on June 21, 2016).
- 蕭新煌、鄭宏泰、尹寶珊，2016，〈社會流動對青年社會及政治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台港澳比較研究〉，週五論壇，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Hsiao et al. 2016. “Shehui liudong dui qingnian shehui ji zhengzhi taidu he hangwei de yingxiang: Taiwan, Hong Kong, Macao bijiao yanjiu” [The Impact of Social Mobility Regard to Social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of Young: A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riday Forum. Taipe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 駱偉健，2003，〈論特別行政區的行政主導〉，《行政》，16 (60)：397-405。Luo Wei-jian. 2003. “Lun tebie hangzhengqu de hangzheng zhudao” [Discuss the Administrative Dominance of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dministration (Macao)* 16(60): 397-495.
- 濠江日報，2016，〈高天賜促政府說明向暨大捐款原因〉，5月7日。Hou Kong Daily. 2016. “Gaotianci cu zhengfu shuoming xiang NJU juankuan yuanyin” [Coutinho asked government to explain the reason of donation]. May 7.
- 譚志強，2010，〈博彩旅遊業與大眾媒體的互動：以《市民日報》的「再現」為例〉，梁潔芬、盧兆興編，《中國澳門特區：博彩業與社會發展》：98-111，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Tam, Chi-keung. 2010. “Bocai luyouye yu dazhong meiti de hudong: yi ‘Shimin Ribao’ de ‘zaixian’ weili” [Interactive between gambling tourism and mass media: A Case by “representation” of “Shimin Daily”]. In “China Macao tequ: bocaiye yu shehui fazhan”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ambling Indust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ds. Leung, Beatrice and Lo, Shiu-hi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蘇嘉豪，2015，《撤！還記得嗎？》，香港：嘉濤宮。Sou, Sulu. 2015. “Che! hai jide ma?” [Withdraw! Rememberable?]. Hong Kong: Kato Kung Publisher.

- 蘋果日報，2014，〈中央發功，逼撤惡法〉，5月30日。Apple Daily. 2014. “Zhongyang fagong biche efa” [Forced to Withdraw the Bad law by Central Authority]. May 30.
- 蘋果日報，2014a，〈反黑箱作業，抗特首享特權，2萬澳門人上街怒吼：「不撤離補即圍立會」〉，5月26日。Apple Daily. 2014a. “Fan heixiang zuoye, kang teshou xiang tequan, 2wan Macao ren shangjie nuhou ‘bu cheli bu ji wei lihui’” [Against to Black Box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Privilege, 20000 Macao People Demonstrated and Called “Surround the Legislative if don’t Withdraw”]. May 26.
- 蘋果日報，2016，〈1億公帑捐暨大，崔世安被促下台〉，5月8日。Apple Daily. 2016. “1yi gongtang juan jida cuishian beicu xiatai” [100 Million Donated to JNU, Chui was Asked to Step Down]. May 8.
-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2016.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for 2016: China (includes Tibet, Hong Kong, and Macau) - Macau” https://www.state.gov/j/drl/rls/hrrpt/humanrightsreport/index.htm?dynamic_load_id=265334&year=2016#wrapper (August 15, 2017).
- Chan, K. M. 201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Bill of Greed and Privilege’ of Macau.” Outstanding Academic Papers by Students,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 Chou, B. K. 2005.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Macau after handov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43): 191-206.
- Gamson, W. A. 1992. *Talking Politic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mson, W. A., and D. S. Meyer. 1996.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eds. D. McAdam, J. D. McCarthy, and M. N. Za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dström, P., R. Sandell, and C. Stern, 2000. “Mesolevel Networks and the Diffusion of Social Movements: The Case of the Swed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1): 145-172.
- Ho, C. B. 2011. “Political Culture, Social Movements, and Governability in Macao.”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38(2): 59-87.
- Ho, Ming-sho. 2015. “Occupy Congress in Taiwan: Political Opportunity, Threat, and the Sunflower Move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5(1): 69-97.
- Ieong, M. U. 2017. “Macao and Hong Kong,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The 2014 Retirement Package Bill Protest and Macao's Governance Crisis.” *Asian Survey* 57(3): 504-527.
- Kaeding, M. P. 2014. “Challenging Hongkongisation: The Role of 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and Perceptions of Post-handover Hong Kong.”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5): 120-133.
- Kaeding, M. P. 2015. “Resisting Chinese Influence: Social Movements in Hong Kong and

- Taiwan.” *Current History* 114(773): 210-216.
- Kitschelt, H. P. 1986.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1): 57-85.
- Klandermans, B., and D. Oegema. 1987. “Potentials, Networks,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 Steps Toward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4): 519-531.
- Kriesi, H., R. Koopmans, J. W. Duyvendak, and M. G. Giugni. 1992. “New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2(2): 219-244.
- Kwong, B. K.-k. 2014. “Patron-Clientelism and Elections in Macao: The 2009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In *China's Macao Transformed: Challeng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ed. E. W. Y. Y. M. K. CHAN.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Lam, A. I.-f. forthcoming 2017. “The Post-1999 Macau Media: Bigger Diversification but Weaker Dominance.” In *Macao: Breakthrough and Change in China's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ds. M. Chan and J. Leong.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Lam, J. 2014. “Democrat Ready to Build on Public's Victory in Macau.”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523351/democrat-ready-build-publics-victory-macau> (August 15, 2017).
- McAdam, D.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Adam, D. 1996.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eds. D. McAdam, J. D. McCarthy, and M. N. Za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 and D. Rucht. 1993. “The Cross-national Diffusion of Movement Idea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28(1): 56-74.
- McAdam, D., J. D. McCarthy, and M. N. Zald. 1996.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 S. Tarrow, and C. Tilly.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J. D., and M. N. Zald.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6): 1212-1241.
- Myers, D. J. 2000. “The Diffusion of Collective Violence: Infectiousness, Susceptibility, and Mass Media Network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1): 173-208.
- Risse, T., and K. Sikkink. 1999. “The Soci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 into Domestic Practices: Introduction.” *Cambrid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6: 1-38.
- Snow, D. A., E. B. Rochford Jr, S. K. Worden, and R. D. Benford.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4): 464-481.
- Snyder, D., and C. Tilly. 1972. “Hardship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ance, 1830 to 196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0-532.
- Tarrow, S. 1998. *Power in Movement: Collective Ac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 Tilly, C. 2004.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Boulder, Colo: Paradigm Publishers.
- Yu, E. W.-y. 2007. “Formal and Informal Politics in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Elections 2004~200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6(52): 417-441.
- Yu, E. W.-y. 2011.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hip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licy.” In *Gaming,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in Macao*, eds. N. M. K. Lam, and Ian Scot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Yu, E. W.-y. 2013. “Macao's ‘One County, Two Systems’: High Autonomy or Intervention?” In *Negotiating Autonomy in Greater China: Hong Kong and its Sovereign Before and After 1997*, ed. R. Yep. Copenhagen, Denmark: NIAS Press.
- Yu, E. W.-y., and K. m. Chin 2012. “The 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Democracy in Macao: Revolutionaries or Loyalists? .”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47(1): 97-116.
- Yuen, S. 2014. “Under the shadow of China: Beijing's policy towards Hong Kong and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ina Perspectives* (2): 69-76.

